

蔡 昉 主编

中国 智慧

Chinese Wisdo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蔡 昉 主编

中国 智慧



Chinese Wisdo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智慧/蔡昉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 - 7 - 5203 - 3588 - 1

I. ①中… II. ①蔡… III. ①改革开放—成就—中国

IV. ①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5684`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约编辑 王玉静 李凯凯
责任校对 王 龙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8.25
插 页 2
字 数 371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改革路径：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	(32)
第二章 对外开放：从参与者到引领者	(60)
第三章 宏观经济：坚持稳中求进统领	(98)
第四章 区域发展：梯度推进到协调发展	(134)
第五章 “三农”政策：从城乡融合发展破题	(165)
第六章 从大规模减贫到精准脱贫	(200)
第七章 产业发展：从做大到做强	(234)
第八章 科技引领：超越传统后发优势	(262)
第九章 生态文明：从手段论到目的论	(296)
第十章 人力资源：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335)
第十一章 社会保障：建设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64)
第十二章 收入分配：走向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407)
参考文献	(438)
后 记	(447)

绪 论

一 引言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迄今已走过了40个年头。孔子曾对人生中的不同阶段做出过如下的经典论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其实，孔子的这种说法并非仅指个体的人生，原本就具有社会层面的含义。有关30年这一阶段，孔子也曾说过：“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根据《论语》权威学者的注解，“世”为一代或指30年时间，孔子此言意味着改善民生的政策需要30年才能够见到实效。而四十不惑则意味着对实际经验的提炼与升华，或者用今天的语言就是，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因此，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分享成就，以及实践经验的积累，既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也意味着需要将这种经验升华为理论，以为中国自身改革的后续推进提供指导，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者带来启迪。可见，这个四十不惑之际，对于理论研究是一个有意义的时间节点。

早在改革开放到了孔子所说“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时候，即1994年，林毅夫、蔡昉、李周即预测了中国经济对日本和美国的赶超^①。

^①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而恰好是当时，克鲁格曼等西方经济学家正在发动一场否定和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论战，我称之为“克鲁格曼—扬诅咒”。

迄今为止，这些学者已经至少发起了三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批评或诅咒。第一轮，基于艾尔文·扬等人的计量研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亚洲四小虎的经济增长仅依靠要素投入，而没有生产率的进步，因此既不是奇迹，也不可持续，堪称“纸老虎”^①。这一次诅咒也捎带着中国。第二轮，他们把目光直接转向中国。艾尔文·扬做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说只需要运用一点统计上的小小技巧就可以将所谓的“中国奇迹”化神奇为腐朽^②。第三轮是在中国经济取得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后开始减速之际，他们宣称中国经济终于要“撞墙”了^③。

他们否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似乎既有理论依据也有经验证据。在理论上，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增长奇迹，是因为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出发，不懂得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发展特点。从这个先入之见出发，他们则有意玩弄统计手腕，从经验上否定中国生产率的改善。既然增长动力主要是要素投入而没有生产率进步，中国经济的增长充其量只是一些体制改革措施带来的一次性向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回归，不可能有很高的潜在增长率，因此，表现出的高增长率从长期看也是不可持续的。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赞成这种唱衰中国经济的观点，而是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增长奇迹。但是，占主流的研究者也由于所依据的不适用的理论假设，以及在经验上认识不深入等这样那

①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6, 1994, pp. 62 - 78.

② Alwyn Young, "Gold into the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1, No. 6, 2003, pp. 1220 - 1261.

③ Paul Krugman, "Hitting China's Wall", *New York Times*, July 18, 2013.

样的原因，没有能够完好地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概括，造成认识上的片面性，也贬低了中国经验的一般意义。大体来说有如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文献。

第一，看不到中国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钱纳里（Hollis Chenery）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认识到了它的体制弊端并进行改革，即便不具备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也能实现一个快速的发展。在一部2008年出版的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著作中，中外学者对改革成效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担任主编的布兰德和罗斯基教授试图用钱纳里这个观点统领全书^①。然而，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发展的必要条件这种观点容易让人困惑，无法解释4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从何而来，因而为“克鲁格曼—扬诅咒”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低估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分享性质。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成就，国内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给予了高度赞誉。然而，对于经济发展结果是否充分得到分享，却有着不尽相同的评价。否定派或悲观派通常不懂得二元经济发展，因而未能充分认识到劳动力转移对于提高农民收入的积极效应，反而经常会有一种声音，认为农民工的工资受到人为的抑制。从经验上，学者们引用一些收入不均等指标，如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比率等变化趋势，来支持这样的结论。

第三，完全忽视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性和内在逻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已故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有一类社会变化实际上“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其含义就是尽管并没有朝着某个既定的方向去努力，结果无意中达到了那个目标。包括同为诺贝尔经

^①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罗纳德·科斯及其追随者如张五常和王宁等人^①，都把中国作为该说法的绝妙案例。把中国改革开放的创举作为无心插柳的结果，从方法论上妨碍我们科学总结中国奇迹和中国智慧，也把中国改革探索者、设计者、实践者的智慧和努力避重就轻地一笔带过。

爱因斯坦曾说：复利是人类的第八大奇迹。从复合增长率的角度，把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工业革命以来几个高速增长大国（英国、美国和日本）在相应时期的增长表现进行比较，可以进一步肯定“中国奇迹”的存在。

英国在 1880—1930 年，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只有 0.9%。以 1880 年时出生人口预期寿命 50 年算，此期间一个平均寿命的英国人，可于自己的一生中感受到生活水平提高 56%。英国的这一增长表现，是对绵延数千年的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的第一次突破。

继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之后，美国成为又一个现代化强国。在 1920—1975 年，美国的人均 GDP 增长率约为 2%。以 1920 年出生人口预期寿命 55 年算，那一代美国人终其一生，生活水平可以达到近一倍的改善。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赶超、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1950—2010 年，日本的人均 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 4%。以平均预期寿命 60 年算，1950 年出生的日本人，一生中经历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将近十倍。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起，改革开放把中国推进高速增长的轨道。在 1981—2011 年的 30 年期间，中国的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为 8.8%，一个普通中国人已经感受到十余倍的生活水平改善。并且在此之后，人均 GDP 仍然保持着持续增长势头。以平均预期寿命 68 岁

^① 如 Ronald Coase and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算，1981 年出生的中国人可以预期活到 2049 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之际。如果过去的增长速度得以保持，终其一生，一个典型的“80 后”中国人可以经历高达数百倍的收入水平提高。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未来不会保持既往的速度，但是，其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改善奇迹，无疑可以提前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

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学术生涯与改革开放发展同步的一代研究者，以严肃的态度和规范的方法，把过去 40 年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准确地揭示出来，阐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自身特色，不仅对于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保持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智慧，对发展经济学做出贡献所要求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近 1/5，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道路，必然会对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经验借鉴，中国方案必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 中国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在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排斥市场机制导致资源配置的宏观无效率，缺乏激励机制导致经济活动的微观无效率，没有奖惩制度伤害了工人、农民和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在政府强力的资源动员下实现的生产要素增长，很大的部分被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所抵消，没能转化为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因此，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可以使微观效率从而经济增长绩效迅速回归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上面。正是因为这个原理，钱纳里所说不具备增长的必要条件也可以实现更快的增长，实际上是指即便“没有形成额外的增长源泉”，仅仅回归“经济增长的稳态”，也可以改善增长绩效。

然而，中国作为十数亿人口的大国，所实现的长达 40 年、高达

9.6% 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是以往的任何经济体都未达到过的增长表现。因此，需要找出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或者说在“把体制搞对”的条件下，增长稳态是什么样的。这才是正确解说其长期增长绩效，以及认识和挖掘未来发展潜力的关键。

正如图 0—1 所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及其带来高速增长的时期，与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是高度重合的。作为人口转变特定阶段即生育率显著下降的结果，1980—2010 年，中国的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年平均 1.8% 的速度增长，而该年龄之外的依赖型人口则基本处于零增长状态（-0.2%）。两类人口增长形成的这种剪刀差态势，同时也表现为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创造了一个人口机会窗口。其产生的对于经济增长的正面促进效应，即所谓的人口红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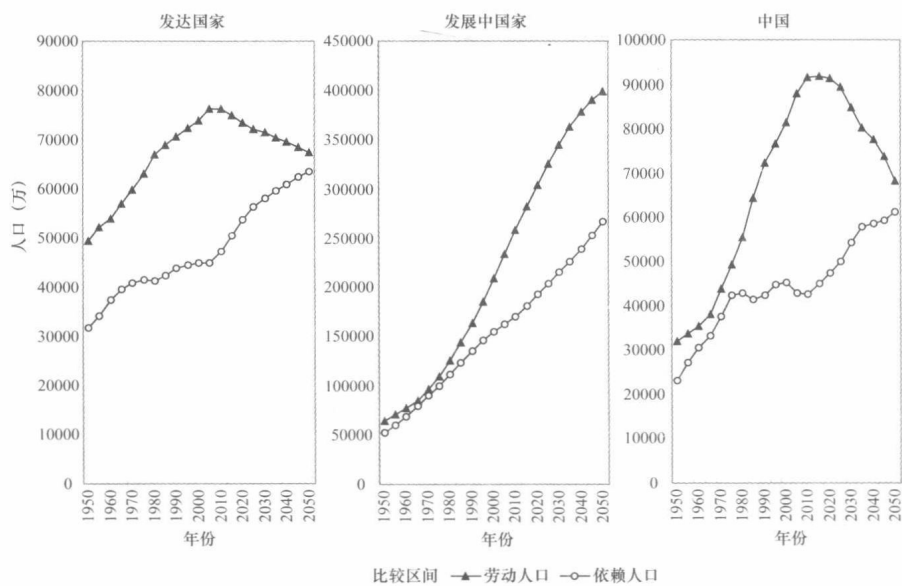


图 0—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机会窗口期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DVD Edition, 2015。

在同一时期里，无论是发达国家作为总体，还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总体，劳动年龄人口和依赖性人口的相对增长态势，都远远不如中国来得有利。例如，在同一时期（1980—2010年），从发达国家平均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增长速度几乎相同；而从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来看，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更快，但是被抚养人口的增长率也是显著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此期间具有的人口结构特点，近乎得天独厚。

在很长时间里，中外决策者和研究者大多认为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就业和社会福利造成压力，因而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随着对发展经验的观察和比较研究，经济学家开始承认在特定的人口转变阶段，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并通过相关经济发展经验对此进行了经验检验，并把这个特有的经济增长源泉冠名为人口红利。经济学家利用增长核算或增长回归方法，在诸如生产函数等式的右手边放入人口抚养比作为一个代理变量，以揭示人口红利的贡献。

采用类似的方法，研究者也观察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尽享人口红利的情况，并从经验上实际估算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例如，王丰和梅森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估计出1982—2000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5%^①。蔡昉和王德文对同一时期的估计显示，其间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高达26.8%^②。

① Feng Wang and Andrew Mason, "The Demographic Factor in China's Transition", 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47.

② Fang Cai and Dewen Wang,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in Ross Garnaut and Ligang Song (eds.), *The China Boom and Its Discontents*,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5.

实际上，如果从广义上认识人口红利作为增长率的贡献因素，或者说不以人口学的思路而是以增长理论来认识人口红利，它们体现在生产函数等式右边的几乎所有解释变量中，成为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而把抚养比作为变量估计出的贡献率，充其量只是人口红利贡献的残差。用东亚经济体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吸收二元经济理论等，来拓展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对人口红利贡献做出新的假设和解释。下面，我们归纳与人口相关的经济增长因素，并借助相关文献提供的经验证据，展示更全面的人口红利的贡献。

首先，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世界银行早期研究发现，在1978—1995年的GDP增长中，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37%^①，而蔡昉和赵文估计的资本积累对增长的贡献率更高^②。近期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显著贡献因素，但是同时发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中，资本深化或资本劳动比的贡献比重很高，且具有提高的趋势^③。

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这个明显贡献，被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为粗放型增长模式，认为由此驱动的高速增长算不上奇迹，也预测其

① World Bank, *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如 Fang Cai and Wen Zhao, “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 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China”, in Aoki, Masahiko and Jinglian Wu (eds.), *The Chinese Economy: A New Transi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③ 参见 Xiaodong Zhu, “Understanding China’s Growt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6, No. 4, 2012, pp. 103–124; IMF, “Asia Ris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Chapter 3 o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eptember, 2006, p. 4; Louis Kuijs, “China through 2020 – a Macroeconomic Scenario”, *World Bank China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9, 2010.

没有可持续性。东亚经济体和中国经验多次证明这种预测的不正确，在理论上也恰恰说明，秉持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失算在不懂得二元经济发展的这个独特增长源泉。事实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验所印证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的确在一定时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①，所以这个贡献实际上是人口红利的一种表现。

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年轻的人口结构意味着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无疑以这种生产要素的充分供给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然而，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是，有利的人口结构条件保障了新成长劳动力的不断进入，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改善，主要是靠这个增量途径实现的。

总体而言，在收获人口红利期间，中国成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改善十分迅速。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数据，1990—2015年，世界平均的期望受教育年限从10.0提高到13.2，而中国从8.8提高到13.5。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更明显、更突出的人力资本改善，无疑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显著。例如，根据沃利等人的估计，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7%。不仅如此，在考虑了教育水平具有促进生产率提高作用的情况下，他们估计的人力资本贡献率可提高到38%^②。

再次，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企业冗员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

① 白重恩等的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中国资本回报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参见 Chong-En Bai, Chang-Tai Hsieh, and Yingyi Qian, “The Return to Capital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2755, 2006）；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情况下，资本回报率则迅速下降（白重恩、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2014年第10期，第3—30页）。

② John Whalley and Xiliang Zhao, “The Con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 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592, 2010.

在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组成部分。库兹涅茨所识别并指出的这种产业结构变革的生产率效应^①，在中国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例如，在前引世界银行的研究中，作者把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残差，前者即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劳动力剩余的农业和冗员的国有企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非农产业和新创企业）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蔡昉和王德文估计早期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1%^②。前引朱小东的研究则发现，1978—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良好表现，靠非国有经济的较快发展和更快的生产率增长率。

最后，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规模大就意味着创新具有更大的需求力度和供给潜力，可以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个观点来自于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史的最新贡献，经济学家也尝试进行了一些经验检验，不过，我们尚未见到以中国为对象的此类经验研究成果发表。

三 中国经济奇迹的充分条件

理论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变为人口红利，在现实中成为高速增长的因素。经验表明，不仅许多具有

① Simon Kuznets,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II: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Labor For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 (Supplement), pp. 3-110.

② 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with 劳动贡献》，《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第62—68页。

与中国相同或类似的人口转变经历的国家，并没有在同一时期，或者在较早或稍晚的时期取得与中国同样的经济增长绩效，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呈现的有利人口结构也没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人口转变阶段把国家或地区分为“后人口红利经济体”（post-dividend）、“晚期人口红利经济体”（late-dividend）、“早期人口红利经济体”（early-dividend）和“前人口红利经济体”（pre-dividend）^①。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 54 个国家和地区被划分在晚期人口红利阶段，即 1985 年时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预计 2015—2030 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或下降或保持不变。中国之外的 44 个有数据的国家，经济增长表现无一可与中国媲美。1978—2015 年，中国 GNI 平均增长率为 9.73%，其他 44 个国家算数平均值为 3.77%。在这些国家中，1978 年中国的人均 GNI 最低，仅为 200 美元。假设其他几个当时人均 GNI 低于 1000 美元的国家具有与中国大致相当的趋同潜力，但是，它们随后的增长率远逊于中国。

事实上，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显现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态势，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也有较好的表现。例如，1980 年中国人均 GNI 或人均 GDP 排在世界上有统计数字的 100 多个国家的倒数第四位，但 25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有数据的 107 个国家中排在第 62 位；出生时预期寿命在有数据的 127 个国家中排在第 56 位^②。虽然低下的人均收入水平代表着较低的资本禀赋，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

① World Bank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5/2016: Development Goals in An Era of Demographic Change*,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6, pp. 268–273.

② 参见 Fang Cai, *Demystifying China's Economy Development*, Beijing, Berlin, Heidelber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nd Springer-Verlag, 2015; Thomas Rawski, “Human Resources and China's Long Economic Boom”, *Asia Policy*, 2011, No. 12, pp. 33–78.

实现了很高的资本积累率。1953—1978 年，中国的积累率平均达到 29.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①。

然而，计划经济却不能完好地解决经济增长的另外两个必要的体制条件，即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问题，因而人口红利并没有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因此，只有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深刻的改革，才能创造出增长的充分条件。

根据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实现成功的经济发展，在体制上需要解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配置问题，因此就要涉及机制、信号、效率和激励等问题。从一个不能解决上述问题的计划经济体制出发，启动最初的改革需要突破的障碍颇多，要在政治上可行和实践中可操作，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改革给特定的劳动者、微观单位和社会群体带来收益，才能形成发动改革的基本动机。第二，这一改革不与任何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直接抵触，即它要的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第三，这一改革潜在地发动起一个关键的变革齿轮，由此推动逻辑链条上其他领域的改革。不过，从事前的角度看，最后这个条件往往是不可知的。

农业中实现家庭承包制和废除人民公社的改革，最符合上述改革前提条件。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家庭承包制改革就在一些地区开始悄悄试行。早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种自发性改革试验已经大量出现在安徽、四川和内蒙古等地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短短几年里，中央政策对之经过了默许现状、允许边远贫困地区试验，及至在全国范围推行等几个阶段的演变，使这一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迅速完成。到 1984 年年底，全国农村的全部生产队和 98% 的农户都采取了家庭承包制的经营形式，随后人民公社

^① Justin Yifu Lin, Fang Cai and Zhou Li,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Revised Edi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71.

体制也被正式废除。

这一改革一举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劳动和经营激励问题，并且在农户获得剩余索取权的同时，也相应赋予和逐渐扩大了他们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权和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在家庭承包制推行的短短几年里（1978—1984年），粮食单产提高了42.8%，总产量增加了33.6%，农业增加值实际增长52.6%。根据计量分析，这一期间农业产出增长的46.9%来自于家庭承包制这一制度变革的贡献^①。同期，农民人均收入名义增长166%，在贫困标准从每人每年100元提高到200元的情况下，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为1.28亿。这一变化也大幅度增加了城市农产品供给，为几年后取消粮票制度创造了条件。

以往的一些分析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中，唯有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可圈可点^②。其实，方式和效果上类似的改革同样发生在国有企业。1978年企业恢复奖金制，实际上是关于工资制度的放权和改革，解决的是职工劳动激励问题，涉及的是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重点解决企业及其经营者的激励问题，触及的是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与国家的关系。

概括而言，作为城市经济改革核心的企业改革，主要沿着三条主线进行。第一，从赋予并不断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逐步构造有活力的经营主体，最终落脚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公司制改造。第二，重新界定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最初的改革以国家向企业让利为特征，目前正在推进的改革，方向是以管资本为主加

① Justin Yifu Lin,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1, 1992, pp. 34–51.

② 例如 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